

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儿童视角的迷失与回归

蒙春柳

(湛江科技学院教育学院,广东湛江 524000)

[摘要]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少年儿童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的重要途径。当前相关研究与实践多从组织者、教育者的成人视角出发,忽视了儿童作为活动主体的内在接受心理。本文基于儿童参与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接受心理机制,系统分析了实践中儿童视角迷失的四种表现,动力机制上强调外在动力、目标机制上侧重知识获得、调节机制上依赖外在调节、行为评价上聚焦量化指标。在此基础上,从认知、制度、方法三个维度剖析迷失成因,并提出了回归儿童视角的实践策略,以期提升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与适切性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儿童视角;接受心理

[作者简介]蒙春柳(1995—),女,贵州三都人,湛江科技学院教育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师教育、青少年教育。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zz0305009>

[中图分类号] G62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少先队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并领导的少年儿童群团组织,其核心使命之一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培养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情感。长期以来,广大少先队辅导员与学校管理者在活动设计中投入了大量精力,活动形式也日益丰富。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困境是许多活动看似形式多样,却难以明了儿童对活动内容的内化情况。儿童在活动中往往扮演被动参与者而非主动建构者的角色,教育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存在落差。

深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现有研究和实践普遍采用组织者中心的视角,即从成人认为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更高效出发设计活动,而较少系统地追问儿童在活动中究竟是如何接收、加工、评价这些爱国主义信息的,他们的兴趣点、困惑点、情感触发点在哪里。这种对儿童接受心理机制的忽视,实质上是儿童视角的结构性迷失。因此,从儿童主体出发,揭示其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心理机制,诊断现实中的迷失表现,并探索回归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儿童参与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接受心理机制

要诊断儿童视角的迷失,首先需要厘清儿童在参与活动时的基本心理运作过程。已有研究指出,

道德接受机制应该存在动力机制、目标机制、调节机制和行为机制四个环节。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主要是心理因素对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的影响,已有研究较多关注这两个机制,这表明了心理因素在个体接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目标机制和行为机制的研究不足,则指出对于心理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注的结合及研究不足。

在具体的机制维度上,动力机制指的是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平衡。儿童是否愿意主动投入活动,取决于其内在兴趣、好奇心、成就感等内部驱动力,还是对外部奖励、惩罚、权威要求的顺从。健康的动力机制应当以内在动机为主导,外在动机作为辅助。

目标机制指的是意义建构与知识获得的统一。儿童参与活动时,不仅是在记忆类似于国旗含义、英雄事迹等事实性知识,更是在构建个人对爱国的理解与感受。这种意义建构是情感、认知与行为倾向的综合结果,单纯的知识记忆不能替代深刻的价值内化。

调节机制指的是自我调节与外在调节的协同。在活动过程中,儿童需要根据反馈调整自己的注意、情绪与行为。过度依赖教师、辅导员的监督与指令等外在调节,会抑制儿童自我计划、自我监控、

自我反思能力的发展。

行为表现指的是过程体验与量化结果的兼顾。儿童在活动中的行为不仅指向最终的如手抄报、演讲分数等成果,更包括参与过程中的探索、讨论、协作、质疑等丰富体验。片面关注可量化的结果,会忽略行为背后真实的态度与情感变化。

儿童并非等待被灌输的容器,而是具有主动加工能力的主体。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尊重并顺应儿童接受心理的运行规律。

二、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儿童视角的迷失

基于接受心理机制,审视当前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在以下四个维度上出现了儿童视角迷失。

(一)强调外在动力,忽视内在兴趣激发

在实际操作中,活动往往被简化为布置任务、检查评比、纳入考核这样一种以外部控制和结果为导向的循环模式。例如,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爱国主题手抄报,并依据美观程度、内容完整性评奖;或组织爱国主义知识竞赛,以名次和奖品作为激励。辅导员常以听话、守纪律为标准评价儿童,而很少追问这个主题是否真正引发了孩子的好奇、活动形式是否契合该年龄段儿童的兴趣点等。其结果是,儿童参与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奖励的渴望或对惩罚的规避,一旦外部激励撤销,其继续探究与践行的意愿便明显下降。

(二)侧重知识获得,忽视情感与意义建构

部分少先队活动将教育目标窄化为记住若干知识点,如开展英雄故事会,重点检查学生能否复述英雄的姓名、事迹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这种取向忽略了儿童在故事中是否产生共情、是否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验、是否形成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认同。当爱国被简化为背诵和答题,儿童便难以建立起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有血有肉的爱国情感。

(三)强调外在调节,抑制自我教育能力

活动过程中,辅导员通常充当全程指挥者的角色,每一步做什么、说什么话、以什么姿势站立,都有明确指令。儿童较少有机会自主规划活动步骤、自主分工合作、自主解决活动中出现的冲突或困惑。例如,在组织社区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时,辅导员会提前将打扫区域、工具分配、流程安排得事无巨细,儿童只需照做。这种高控制下的活动,剥夺了儿童练习自我调节的机会,他们不会思考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我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从而难以将外在规范内化为个人行为准则。

(四)关注量化评价,忽略过程性体验

评价环节往往追求可测量的指标,例如上交作品数量、参与活动人次、竞赛得分、演讲时长等。一个孩子在听到国歌时眼中闪过的庄重神情、在讨论如何爱护国旗时提出的稚嫩却真诚的想法、在活动后自发向同伴讲述历史故事的行为,这些无法量化的宝贵内容却很少被纳入评价视野。这种数据崇拜使得辅导员倾向于选择最容易产生可视成果的活动形式,而对那些体验性强但难以迅速产出作品的形式投入不足。

三、儿童视角迷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迷失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可以从认知、制度及方法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认知上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解不足

辅导员虽然具有一线经验,但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解仍更多地与知识学习相关,对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的接受心理机制未有系统理解。他们容易将儿童视为与成人仅在知识量上存在差异的小大人,而忽略了他们在思维特点、情感体验方式、道德推理水平等方面的独特性。例如有的辅导员要求低年级儿童理解国家主权等抽象概念,并以此作为活动成功标准,本质上是对儿童认知能力的误判。

(二)制度上评价导向与行政化压力的影响

学校少先队工作常被纳入上级对学校的考核体系,考核指标多为量化数据,如活动次数、规模、宣传报道层级、获奖数量等。在有限的精力下,辅导员自然倾向于选择短平快且看得见的活动模式。此外,安全责任压力使得学校普遍不愿意放手让儿童自主策划与实施活动,因为可控性是行政管理者优先考虑的因素。制度环境的不支持,进一步固化了成人主导、儿童服从的活动范式。

(三)方法上缺乏科学的儿童需求诊断工具

大部分辅导员即使意识到要倾听儿童的声音,也往往不知道如何系统、有效地收集儿童的真实想法。常见的写感想、开座谈会等方式,会由于成人在场的权威效应而使儿童说出老师想听的话。缺少诸如绘画表达、情景投射、匿名涂鸦墙、儿童主导的焦点小组等适切工具,使得辅导员难以获取真实的儿童视角信息,从而继续按照自己的假设开展活动,形成恶性循环。

四、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儿童视角的回归

基于以上分析,实现儿童视角的回归不是简单地“让孩子说了算”,而是在尊重儿童发展规律的前

提下,重构活动的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全流程。

(一)以情境化游戏化激活内在动机

传统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常采用任务驱动模式,即教育者预先设定明确的行为目标与完成标准,儿童按照指令完成规定动作以获得外部评价或奖励。这一模式在管理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框架下虽具效率优势,但应用于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时存在三重悖论。

其一,外在激励对内在兴趣产生挤出效应。根据德西与瑞安的自我决定理论,当个体感知到行为由奖励、惩罚、考核等外部控制主导时,源于好奇心、胜任感与自主性的内在动机会受到抑制。若儿童绘制手抄报的主要动因是为了班级加分或避免批评,其对“为什么要爱国”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欲望便会减弱,活动结束后相关认知与情感也更容易消退。其二,任务逻辑与情感逻辑错位。爱国主义本质上是情感认同与价值承诺,其生成依赖于具身体验、情感共鸣与意义建构,而非线性任务的完成。任务驱动模式将复杂的情感教育切割为可量化的操作步骤,剥离了爱国主义所蕴含的叙事张力、道德困惑与情感温度,使儿童获得的是一组去情境化的符号,而非有生命力的信念。其三,成人预设与儿童经验断裂。任务通常由成人定义,内容、难度与呈现方式未必契合儿童当下的生活经验与认知图式,导致教育活动沦为完成任务而非意义的相遇。

情境化与游戏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顺应了儿童主导的学习与活动方式。从认知发展看,7~12岁儿童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思维高度依赖具体事物的支持,抽象概念必须通过可感知的情境、角色、故事和操作来具身化。从动机心理学看,游戏天然具备激发内在动机的四个核心特征。一是自主性,指在规则范围内拥有选择权;二是胜任感,指挑战难度与能力动态匹配;三是关联性,指满足社会联结需求;四是叙事沉浸,指在假想情境中体验英雄角色、面对道德抉择。从情感激活机制看,儿童对故事叙事、规则游戏和角色扮演的天然偏好,源于进化与文化共同塑造的心理需求。将爱国主义元素嵌入这些形式,本质上是借用儿童已有的心理通道输送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需要强调的是,“嵌入”不同于“添加”。添加仅保持活动形式不变而简单粘贴爱国标签,无法改变任务驱动的本质;嵌入则是将爱国主义的认知内容、情感价值与行为要求,转化为活动形式内在的规则、角色、目标与反馈机制,使儿童在主动参与中自然完成意义建构。

(二)确立三维整合的儿童化目标体系

传统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目标设定上存在重知轻情而忽视意向的倾向,即过于侧重事实性知识的记忆与复述,而忽略了情感体验与行为意向的培养。然而,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是价值观教育,其核心任务是帮助儿童完成从知道到认同、从认同到践行的转化,这一过程无法仅靠认知目标的达成来实现。认知是基础,但认知并不必然导向情感认同,儿童可以准确陈述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却可能仍在升旗仪式上嬉笑打闹。情感是认知通向行为的关键中介,那些激发强烈情感体验的内容更容易被内化为稳定的态度倾向。行为意向则是检验教育实效的最终标尺,关注的是儿童在脱离成人监督后的自主行为选择。因此,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同时关照认知、情感与行为意向三个维度,三者缺一不可,且应形成相互支撑的逻辑链条。

更为关键的是,三维目标必须以儿童可理解、可体验的方式进行表述,而非沿用成人中心的教学语言。所谓可理解,是指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儿童生活经验范围内可把握的具体图式,如使用具象替代抽象、使用故事叙事替代命题陈述、加强使用类比与隐喻等。所谓可体验,是指目标应当指向儿童可以直接参与的行动和可以直接感受的情感,使用行为动词替代心理动词,设置可操作的任务情境,并允许多元化的体验表达通道。

在实践中运用三维整合目标体系,需避免三种常见误区。一是三维机械拼凑、缺乏内在关联,认知、情感、行为意向三者应形成逻辑链条,让情感成为认知的自然延伸,让行为意向成为情感的投射。二是目标表述仍停留在成人化语言,真正的儿童化目标应当像儿童自己会说的话,而非成人替儿童说的“正确的话”。三是忽视儿童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应设置基础目标、进阶目标与拓展目标等,允许不同起点的学生在各自最近发展区内取得进步。由此,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从任务驱动转向意义建构,使儿童真正成为目标的理解者、认同者与追求者,而非被动的执行者。

(三)赋能儿童自主组织与自我调节

在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调节机制的优化要求从过度依赖外在监督转向培养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其核心路径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有梯度地让渡活动主导权。初级阶段,由辅导员设立活动的大框架与基本规范,同时允许儿童在主持词

编写、角色分配等部分环节拥有自主决策空间,使儿童在有限范围内体验选择权与责任感的统一。进阶阶段,可设立中队自主活动日等常态化机制,由队干部带领队员自行完成活动策划、组织实施与总结复盘的全过程,辅导员则退居幕后,仅作为资源提供者与安全观察员,除非出现原则性偏差或安全隐患,否则不干预儿童的具体决策与执行。高阶阶段,鼓励儿童建立爱国主义教育金点子库,通过定期票选机制将儿童自己设计的方案转化为真实开展的活动,使儿童的创意与想法真正成为教育内容的重要来源。

在这一梯度赋权的过程中,辅导员的角色从指挥者转变为支架的搭建者,其工作重心在于系统培养儿童事先计划、按计划执行、事后反思的完整行为习惯与能力。具体而言,辅导员可以引导儿童在活动前填写简易的活动计划表,明确目标、分工与时间节点;在活动中鼓励儿童按照计划推进,并在遇到困难时尝试自主协商解决而非立即求助;在活动后组织简短的复盘讨论,引导儿童对照计划检视完成情况,识别成功经验与改进空间。通过这种梯度赋权与方法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儿童逐渐将外在的活动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其自主性、责任意识与反思能力也在真实的活动情境中得到自然生长。当儿童不再需要辅导员时刻监督便能自主组织一次有质量的爱国主义主题活动时,外在调节才真正完成了向自我调节的转化,而这正是爱国主义教育从他律走向自律的关键标志。

(四)引入多主体多模态的发展性评价

在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行为评价的焦点应从可量化的成果指标转向儿童的真实成长过程,其核心取向是建立儿童成长叙事式的评价体系。这一体系的首要特征是过程性记录,即不再仅关注活动的最终产出,而是通过多种叙事化工具捕捉儿童在活动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情感波动与思维变化。采用学习故事、影像日志、儿童自绘成长图谱等方式,将儿童那些无法被分数捕捉的珍贵瞬间转化为可视化的成长证据。这种记录方式本身就具有教育价值,当儿童看到自己的某个瞬间被认真记录并得到回应时,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思考与情感是被看见、被重视的,从而形成积极的情感联结与自我认同。

该评价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引入多主体参与,打破教师或辅导员作为唯一评价者的垄断地位。儿童自评引导其回顾自身表现,识别今天最让自己

满意的一个瞬间,培养元认知能力与自我肯定意识;同伴互评鼓励儿童发现他人的闪光点,学会具体而真诚地表达欣赏,同时也在评价他人的过程中反思自身;家长观察则提供了校外场景下的行为证据,使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评估从学校情境延伸到家庭与社区生活。多主体评价并非简单汇总各方意见,而是让儿童在不同视角的反馈中形成更立体、更丰富的自我认识,同时体验到评价不是为了区分优劣,而是为了促进成长。

该评价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弱化量化指标与横向比较。传统模式中作品评比、分数排名等做法容易诱发功利心态,使儿童将注意力从活动本身转移到外在评价上。发展性评价要求取消或大幅降低作品评比的权重,代之以多元的非竞争性称号,类似于“最具创意观点”“最温暖行动”“最认真倾听”等称号指向具体的行为与品质而非抽象的名次,且原则上人人可以获得不同维度的肯定。横向比较被纵向的自我比较取代,评价的核心问题从我比别人好还是差转变为我今天比昨天有哪些进步。通过这种评价范式的转换,儿童逐渐将评价内化为自我成长的参照,而非外部控制的工具,从而为爱国主义情感与行为的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五)辅导员提升儿童视角的转化能力

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中儿童视角的回归,最终有赖于辅导员群体专业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其核心是将儿童研究正式纳入辅导员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核心模块。长期以来,辅导员的培训内容多集中于活动组织技巧、少先队礼仪规范、文件政策解读等成人侧的能力,而对儿童的认知特点、情感规律、话语习惯、兴趣偏好等儿童本身问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方法训练。这种缺失导致辅导员即使有尊重儿童主体性的意识,也往往不知道如何获取真实的儿童需求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活动设计的依据。因此,将儿童研究能力确立为辅导员的核心专业素养,是实现从成人中心向儿童视角范式转换的基础性工程。

具体而言,辅导员需要重点发展三方面的能力。第一,儿童观察技术。辅导员应当学习如何在自然情境中捕捉儿童的真实反应与潜在需求。这包括掌握结构化观察与非结构化观察的方法,学会从儿童的绘画作品、日记、自由游戏等自然的活动中读取有价值的信息,以及通过非正式谈话闲聊、午餐时间交流等低压力情境收集儿童的真实想法而非标准答案。第二,适龄化转化策略。这是将

宏观的爱国主义教育目标转化为儿童可理解、可参与、可表达的具体活动语言与形式的的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能力,即将成人话语体系中的政治命题转化为契合不同年龄段儿童认知水平与兴趣偏好的活动设计。第三,行动研究能力。辅导员应当具备以自身实践为对象的研究意识与方法论素养,能够以班级或中队为单位,围绕什么样的活动形式更能激发本班儿童的爱国情感、不同性格特质的儿童对同一活动的反应有何差异等具体问题开展小课题研究。通过收集数据、分析反思、调整实践、再次验证的循环,形成基于实证的持续改进机制,而非依靠直觉或经验重复惯性操作。

少先队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培养背诵爱国知识的儿童,而是培育内心生长出爱国情感的少年。当前实践中儿童视角的迷失,根源于成人对儿童心理机制的认知盲区与束缚。回归儿童视角,不是降低爱国主义教育的严肃性与深刻性,而是以更科学、更人本、更有效的方式让爱国主义真正走进儿童的心灵。这需要教育者从动力、目标、

调节、评价四个维度系统转型,将儿童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创造者与评价主体。

参考文献:

- [1]陆士桢.中国少年儿童组织教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2]朱莉萍.系统构建少先队仪式课程:为少年儿童打下鲜亮的人生底色[J].中小学管理,2025(10):50-52.
- [3]赵霞.少先队改革视域下新时代好少年培养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与路径创新[J].少年儿童研究,2025(5):28-40.
- [4]黄世虎.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机制[J].求实,2001(5):59-61.
- [5]杨江丁,林频.论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对少先队分层教育的借鉴意义[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46-49.
- [6]李晓瑜,崔欣伟.少先队辅导员专业能力发展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基于全国8831个样本的调查数据[J].少年儿童研究,2025(2):99-109.

The Loss and Return of the Child Perspective in Young Pioneers' Patriotic Education Activities

MENG Chun-liu

(School of Education, Zha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Young Pioneers' patriotic education serves as a crucial pathway for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value form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s in this field predominantly adopt the adult perspectives of organizers and educators, often overlooking the intrinsic receptive psychology of children as active participants. Drawing on the mechanisms of children's receptive psychology during their engagement in Young Pioneers' patriotic education activit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four manifestations of the loss of child perspective in practice: emphasizing extrinsic motivation in the dynamic mechanism, prioritizing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goal orientation, relying on external regulation in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focusing on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 behavioral evaluation.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is loss from cognitive, institutional, and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s, and proposes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turning to a child-centered perspective.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Young Pioneers' patriotic education.

Key words: Young Pioneers; patriotic education; child perspective; receptive psychology